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部落地圖」調查之省思：以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為例

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es: A Case of the Laipunuk Research
by the Bunun

doi:10.6275/JETS.10.35-63.2005

東台灣研究, (10), 2005

Journal of Eastern Taiwan Studies, (10), 2005

作者/Author：石垣直(Ishigaki Naoki)

頁數/Page：37-6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275/JETS.10.35-63.2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部落地圖」調查之省思： 以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為例*

石垣直

東京都立大學 博士候選人

摘 要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族社會裡興起了一項「部落地圖」調查活動。這是指對南島語系原住民族的居住區域及其祖先過去的活動領域，所進行的繪製地圖之活動。透過這類調查研究，原住民不僅只是繪製一張地圖而已，並且希望藉此調查而建立與該土地有密切關聯之民族史，進而作為要求與土地相關的原住民族權利的根據。本文的目的擬從人類學的觀點，藉原民會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以及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省思「部落地圖」調查活動之正面作用以及現行調查活動所依據的前提「確定傳統領域」可能導致的困境。透過此省思，筆者擬對今後此類的「部落地圖」調查提出幾點建議：1、正視「傳統領域之動態性」論點之重要性；2、加強對在地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土地概念及土地制度)之調查研究；3、重視歷史文獻翻譯／解讀，以助在地人建構其歷史主體性。

關鍵詞： 台灣原住民 部落地圖 布農族 土地 內本鹿

* 撰寫本文所依據的田野資料，是筆者於2003年4月至2005年2月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員的身分，以及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之間從事的田野調查所得。其間在第一年度(2003年)從事調查之際，承蒙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2003年度)以及富士日洛克斯(FUJI XEROX)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之研究資金(2003年度)，以及「公益信託 澁澤民族學振興基金」的研究生助成金(2005年度)之贊助。筆者在台灣各地調查時，如果沒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布農文教基金會和熱誠的布農族諸位朋友的支持與協助，以及東京都立大學陳文玲協助修改中文原稿的話，本文不可能順利完成。另外，特別要感謝的是東台灣研究會的論文審查者不厭其煩地審閱拙作，並提供筆者許多寶貴的意見，使得本文得以更臻成熟。最後在此再一次對各單位及各位支持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前言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社會裡興起了一項繪製「部落地圖」的調查活動。其目的不僅只是為了繪製南島語系原住民族及其祖先居住區域及活動領域之地圖而已，並藉著這項調查欲建立與該土地有密切關連之歷史，進而做為將來要求與土地相關的原住民族權利的根據。這項調查活動近年來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原民會」）的主導推動之下，由包括了中央及地方政府人員、地理學者、生態學者以及原住民的民間團體等共同參與。計畫名稱有「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等不同的稱謂，本文依照現行的一般通稱，將這些調查及相關的活動統稱為「部落地圖」調查。

筆者從 2003 年 5 月起在台灣以布農族為主要對象，進行長期的社會／文化人類學（以下簡稱為「人類學」）田野調查¹，研究現代台灣原住民族的認同問題。因為筆者的研究主題並非在於「繪製部落地圖」或「傳統領域調查」，而是「繪製部落地圖的原住民之認同」，所以有關原住民傳統地名、傳說、領域等資料不是筆者主要的調查目的。儘管如此，筆者仍然參加過三次的調查預備會議及成果研討會²，及參與七次的舊部落探勘活動。³ 其間並且訪談了幾位深度參與「部落地圖」調查的相關人士。

¹ 期間是從 2003 年 5 月到 2004 年 3 月，2004 年 5 月到 2005 年 2 月以及 2005 年 10 月到 2006 年 1 月，總共約 25 個月。

² 一次是 2003 年 7 月 7-8 日，由原民會主辦，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舉行的「原住民族山川傳統名稱調查研究計畫『學員暨調查員培訓工作坊』」；第二次是 9 月 18 日「信義鄉公所研商『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及恢復原住民部落傳統名稱』工作計畫第二次會議」；第三次是 2005 年 2 月 24-25 日在國立台灣大學舉辦的「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學術研討會」。

³ 第一次（2003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7 日／台東縣延平鄉「壽」駐在所等）；第二次（2004 年 2 月 3-6 日／南投縣信義鄉 *Qatungulan* 聚落等）；第三次（2004 年 3 月 27-30 日／南投縣信義鄉 *Mas-talum* 聚落等）；第四次（2004 年 11 月 22-26 日／南投縣信義鄉郡大溪西岸）；第五次（2004 年 12 月 21 日-2005 年 1 月 9 日／台東縣延平鄉、海端鄉「朝日」駐在所等）；第六次（2005 年 11 月 16-20 日／台東縣延平鄉「清水」駐在所等）；第七次（2005 年 12 月 5-8 日／南投縣信義鄉郡大溪西岸）。第一、五、六次是由財團

因此，筆者根據上述的參與調查撰述了本文。本文的目的擬從人類學的觀點，藉原民會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以及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省思現行「部落地圖」調查的正面作用及困境，並對今後的相關調查活動提出筆者的觀感及建議。

以下是本文各節提要：第二節，介紹台灣原住民「部落地圖」的發展背景與現況，回顧並整理由行政機關所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計畫；第三節，以台東縣延平鄉布農族為例，梗概介紹布農族之社會歷史與土地領域之關係；第四節，筆者對現行「部落地圖」調查進行省思，並提出對今後的研究之建議。⁴

二、「部落地圖」調查的發展背景與現行計畫

「部落地圖」調查是「community mapping」、「aboriginal mapping」或者是「participatory mapping」的中譯，以在地居民的參與為基礎所繪製的（舊）部落地圖或生活領域之地圖，有時使用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等現代科技為工具（林益仁 2001）。雖然此類製圖活動在加拿大及阿拉斯加自 1960 年代起，已經約有 30 至 40 年左右的歷史，但是在美國的其他地區及亞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它卻僅有不到 5 年或 10 年的歷史（Chapin et al. 2005）。

近年來在台灣「部落地圖」調查活動在原住民社會中急速擴展，其背景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因素：

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第二、三次是由信義及高雄縣三民鄉公所，第四、七次是由信義鄉 L 村天主教信徒等舉辦的。

⁴ 筆者於 2005 年 3 月 26 日-27 日在東京外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台灣原住民研究——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曾經報告過〈部落地圖運動：以台灣·布農族為例〉，該文收錄於《台灣原住民研究：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回顧と展望》（石垣直 2006）。本文之事例亦參見該文。

第一，可溯源自 80 年代中期起勃興的原住民族運動的長期影響，尤其是 19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初期原住民推展的「還我土地」運動，參與的原住民主張將原屬於原住民之土地劃為保留地、全面發放保留地的所有權、國家未經原住民的同意不得任意徵收原住民土地、國會立法管理原住民族保留地等之訴求⁵，至今「還我土地」仍是目前原住民族的主要訴求之一。

第二，1999 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蘭嶼與原住民族各族代表訂立了「新夥伴關係」⁶，上任後並任用曾經長期參與原住民族運動的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布農族）為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上任後主張恢復原住民的土地權以及成立原住民族自治區等執政目標。直到現在「部落地圖」調查以及原住民族自治依然是原民會在推動的主要政策之一（施正鋒 2005：第 7 章）。

第三，生態保育意識的潮流也是背景因素之一。台灣社會近年來對於生態環境的關切促使了台灣的生態旅行及登山熱潮。同時國內的地理學者和原住民本身也對在地地理知識以及生態智慧漸感興趣（台邦·撒沙勒 2004）。因此，「部落地圖」調查研究多是由生態學者、地理學者以及原住民學者在主導。

台灣原住民社會中進行的「部落地圖」調查是透過繪製有關祖先們曾生活過之（舊）部落的地圖，而欲發掘與該土地之歷史以及恢復原住民族權利之運動，有時與「尋根之旅」⁷共同進行。雖然各個調查研究的主導

⁵ 雖然政府也著手實施原住民保留地的增編、劃編，可是其實施狀況並不順利，也還有要待解決的一些問題（藤井志津枝 2001：251-259）。

⁶ 1999 年的新夥伴關係的簽訂也有為了選舉的政治考量的成份。1999 年的新夥伴關係以及 2002 年 10 月 19 日陳水扁以總統的身份再次肯定新夥伴關係的內容，參見施正鋒（2005：151-156）。

⁷ 原住民的「尋根之旅」活動則早在 1990 年代就已經在各地地方開始了。所謂的「尋根之旅」活動是指探勘祖先之居住地及調查與該群體有關的歷史史蹟活動等。例如，南投縣信義鄉村布農族的尋根活動（拉芙嵐管理委員會 1998）、泰雅族的 *Pinsbukan*「巨石尋根」（趙啟明 1999）、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人的尋根與生態調查（台邦·撒沙勒 2004）

者及其學科不一樣，但是他們所強調的就是對在地人的「賦權」(empowerment)、在地人的參與以及部落復興和發展。

1997 年由魯凱族人實施的調查，可以說是由台灣原住民主動進行部落地圖調查的先驅研究（台邦・撒沙勒 2004：139-140）。在原民會的研究報告書中亦介紹了各地原住民曾經進行過的先驅性「部落地圖」調查的實例。筆者將之摘要製表如下。（本文以下人名之敬稱、職稱恕略）

表：先驅性「部落地圖」調查事例一覽表

主導者（學科／族別）	地點（族別）	調查重點及進行方式
蔡博文、林俊強（地理學）	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泰雅族）。	使用現代科技，訓練工作人員。
汪明輝（地理學／鄒族）	鄒族傳統領域。	以在地人為主體的田野調查。
林益仁（生態學、文化地理學）	宜蘭縣大同鄉卑亞南部落（泰雅族）。	使用現代科技，簡易 GIS 系統。主張賦權。
紀駿傑（生態學）、陳毅峰（地理學）、印淖、乂丌有史（在地學者／阿美族）	花蓮縣光復鄉噶馬匹部落（阿美族）	部落重建。與在地人共同作業。
劉炯錫（生態學）、台邦・撒沙勒（人類學／魯凱族）	屏東縣與台東縣界線一帶（魯凱族）	與在地人共同進行，主張賦權與部落發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I-27-29。筆者製表。

關於行政單位主導的部分，原民會自 2002 年起實施了「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與「傳統山川名稱調查」之計畫，其結果共發行了 6 本以上的研究報告書。⁸ 不過，如同這些研究報告書中註明的，由於這些成果乃屬原

等。而目前尚未受到政府認定為原住民族的平埔族近幾年來也在推動著類似的「尋根之旅」活動，參見《自由時報》2003 年 11 月 23 日及《台灣日報》同年 11 月 27 日等。筆者認為，由於 60 年代以後台灣的急速工業化與經濟發展，主流社會的漢人開始意識到「在地傳統」而興起鄉土文學的熱潮，伴隨著 80 年代中期蓬勃的台灣民主化、本土化和原住民族運動之興起，都是影響到原住民社會各地興起這類的尋根活動的因素（石垣直 2006）。另外，根據相關研討會（參見本文注 4）中的討論以及本文審查者的意見，也有學者認為，90 年代中期以來政府政策之「社區總體營造」亦是直接推助這股風潮的因素。但是由於筆者目前尚未掌握以茲證實其關連性的有力資料，所以對此意見暫持保留態度，留做日後調查研究之課題。

⁸ 筆者手頭上有的行政院原民會之調查報告書分別是：《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2002）、《原住民傳統土地調查：研究報告》（2003a）、《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調查：研究報告書》（2004）；後者出版了《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一期：花蓮縣及

住民的智慧財產，在目前尚未獲得他們允諾的狀況下，在此無法引用其內容。因此，以下只能以該研究報告書之「計畫概要」等為主，概觀原民會所主導的繪製「部落地圖」調查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

在該研究報告書的「計畫緣起」中強調，在地人在繪製「部落地圖」計畫中具主體性之參與、利用 GPS 或 GIS 做對有關傳統領域之資料與數據的收集、記錄、整理、運用的意義，以及透過調查獲知土地相關知識、生態知識和繼承給後代之重要性；同時也強調「部落地圖的推動，有助於凝聚部落與社區的共識，部落地圖最大的功能，是讓原住民部落共同學習並體認管理土地資源的重要性，並找出部落文化、經濟與社會永續發展的契機」等。為達成以上諸目標，該調查計畫中制定：1.調查研究 30 個原住民部落⁹的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2.確定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之位置、範圍；3.完成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範圍之地理資訊系統(GIS)之建置；4.繪製社群或部落活動地圖，並利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繪製各部落領域立體模型圖等研究調查項目¹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I-1-3）。

其中，依據該研究報告書之解釋，所謂的「傳統領域」是「日治時期以後台灣本島之公有土地」，就是包含著：1.原住民舊部落及其周邊耕墾游獵之土地；2.原住民祖先耕作、聚居、游獵之土地；3.政府徵收、徵用作為其他機關管理而目前已放棄荒置或為使用之土地；4.原住民使用河川浮覆地；5.原住民部落傳統以來所屬漁場之海域（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台東縣》(2003b)、《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二期：南投魚池以南》(2003c)、《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三期：南投仁愛以北》(2003d)。

⁹ 這是研究計畫第一年度(2002 年度)的調查範圍。

¹⁰ 而為了實施此類利用 GPS 以及 GIS 的傳統領域調查，該研究計畫採取的計畫內容及實施程序是：1.相關文獻蒐集整理；2.引介國際相關經驗；3.編組調查團隊，並舉辦培訓輔導員以及在地調查員之工作坊；4.部落組織與溝通、部落討論、部落訪談；5.使用 GPS 實地勘查；6.調查資料的整理、處理、修正；7.展示、圖說、保存、維護、更新與應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I-3-4）。

2002：I—2-3、30）。關於原民會在此所界定的「傳統領域」筆者擬在第四節中進一步討論。

研究計畫的第二年度（2003 年度），其調查區域從第一年度的 30 個部落擴張為原住民族聚居的 55 個鄉鎮市。第三年度（2004 年度）以後也持續輔導各地的調查團隊對尚未進行調查部落實施調查，並在已經調查過的部落中選出條件較好的原住民部落為「示範部落」，深入輔導（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5）。2005 年 2 月 24-25 日在國立台灣大學舉辦了 3 年來的調查成果「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學術研討會」。¹¹

三、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

由行政單位或者地理學者所主導在布農族各地進行的「部落地圖」調查，其研究成果已經發表於上述原民會出版之各種研究報告書裡面。另一方面，也有由民間團體所主導的繪製布農族「部落地圖」，其中一例就是在被稱為「內本鹿」的台東縣延平鄉以及海端鄉一部分山地所實施之調查計畫。有關此項調查研究筆者已經在別篇論文中做過詳細介紹（石垣直 2003、2004、2005），本文僅簡要敘述。¹²

（一）布農族社會組織與活動領域之遷移史梗概

布農族過去居住於山地，以小米耕作為主的山田燒墾以及狩獵維生（瀨川孝吉 1954）。目前約有 4 萬人口的布農族，他們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將台灣山地約四分之一的地方（現行行政區域的南投縣仁愛鄉、信義

¹¹ 由地理學者、生態學者以及當學者發表了有關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PGIS)與原住民賦權、傳統領域地圖與原住民族自治、全球化或者後殖民情境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等的研究報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秘書處 2005）。

¹² 在原民會主導的「傳統山川名稱調查」中，內本鹿一帶調查的承辦人是延平鄉出身的布農族人阿力曼（Adiman·Ma-dikla-an）。其研究成果已經在有些研究報告裡發表過（阿力曼 200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b）。

鄉，花蓮縣萬榮鄉、卓溪鄉，台東縣海端鄉、延平鄉，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歸於其勢力範圍之下。

根據布農族人的口述歷史，他們的祖先原居住於台灣西部平地，後來由於受到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的漢人或者平埔族的壓迫而遷移到現在的南投縣一帶山地生活，在這一帶建立 *Taki-tudu*（卓社群）、*Taki-baka*（卡社群）、*Tak-banua*（巒社群）、*Taki-vatan*（丹社群）、*Is-bukun*（郡社群）等之諸 *asang-daingaz*¹³（「大聚落」之意）。¹⁴ 各個社群是以父系大家庭（*lumaq* 或 *lumah*）為基礎的複數父系氏族¹⁵所形成的。但是這些父系氏族為尋求山田燒墾地（*quma* 或 *huma*）以及狩獵地（*qanupan* 或 *hanupan*）而不斷的遷移居所，大約 18 世紀初期或中葉他們開始往中央山脈的東部及南部方面遷移，最後在 19 世紀後半期遷移到台灣南部（現在的台東縣延平鄉與高雄縣桃源鄉、三民鄉山區）（移川子之藏等 1935）。因此以單一或者複數的父系氏族而形成 *asang*（聚落）以及各個父系氏族管理的土地散布於台灣山地各個地方（馬淵東一 1974）。

1895 年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山地原住民亦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台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為「總督府」）以土地奪取及由警察權力「教化」或同化為統治的基本政策。在 1930 年的霧社事件之後針對原住民實施大規模的集團移住政策，許多住在山區的原住民族在被半強迫及半利誘之下遷移到山麓（山路勝彥 2004）。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歷經改信基督教、天主教等、生活改進運動與土地測量事業、80 年代中期之後的民主化等社會環境變遷之影響，該社會的面貌已然產生極大的變化，例如，

¹³ 本文所使用的布農語拼音是以原民會於 2005 年 12 月頒定的「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布農語書寫系統）為準。

¹⁴ 雖然曾經也有遷移到鄒族領域裡的另外一個 *Tak-pulan*（蘭社群），但是日治時期已經被鄒族同化了（移川子之藏等 1935：138-139）。

¹⁵ 布農語是 *tas-tu-siduh* 或 *tas-tu-sidug*（「一個種類」之意）或 *kautuszang*（「來自於同源」之意），巒社群與郡社群較常用後者名稱。

外出工作造成部落裡人口大量流失等（黃應貴 1992）。因此，現在的布農族與其他原住民各族群一樣地忍受著被邊陲化之地位（Yang 2001）。

（二）關於內本鹿及其歷史

mai-asang（或 *mi-asang*）是布農語「以前的聚落」之意。台東縣延平鄉一帶之布農族人所謂的 *mai-asang* 是指「內本鹿」（*Laipunuk*）¹⁶，此地名是因其北部一帶曾經是萬斗籠社¹⁷的勢力範圍而得來的，魯凱族稱之為 *Oponohu*，布農族則稱之為 *Laipunuk*。據說對自 18 世紀初期至中期開始將勢力範圍由現今南投縣一帶的山地擴散到花蓮、台東、高雄方面的布農族而言，當時的內本鹿就是他們最新的移民地。¹⁸ 在 1931 年於在地做調查的日本人類學者馬淵東一，根據當時還健在的第一批移住者的說法，判斷其最早移到在地的時期大約為當時的 55 年前，即 1870 年代中期（移川子之藏等 1935：166-168）。

在 1900 年代初期總督府開始與內本鹿的布農族人接觸，然後延著橫貫該區域內的「內本鹿越道路」，一個接一個地建設了「紅葉谷」、「清水」、「楓」、「嘉嘉代」、「桃林」、「橘」、「壽」、「常盤」、「朝日」、「出雲」等駐在所。但之後在原住民區域發生了所謂的「蕃害」，在霧社事件（1930 年）之後，包含內本鹿地區等布農族南部居住區之居

¹⁶ 其中包含 *Kadangadan*、*Sulisaban*、*Mas-dala*（北絲鬬溪上游）、*Padan*、*Salbi*、*Taki-vahlas*、*Suntik*、*Kapdatan*、*Madaipulan*、*Kalisihan*、*Tansiki*、*Taki-sayan*、*Navas*、*Takis-tsivanan*、*Batingul*、*Mas-huaz*、*Mas-dala*（北絲鬬溪下游）、*Tavilin*、*Halipusun*、*Mas-vanu*、*Padan-daingaz* 等約二十個聚落（移川子之藏等 1935：附錄「系統別分布地圖」、「氏族分布一覽表」；蔡善神 2004：第 3 章）。

¹⁷ 萬斗籠社即「魯凱族下三社」之一，萬山部落的舊社名。他們目前住在高雄縣茂林鄉萬山村，是在 1956 年前後在國民政府的輔導下，從過去居住的舊萬山集團遷移到現今的萬山村居住。

¹⁸ 有關內本鹿布農族的研究，黃應貴在「失落的內本鹿」演講中曾提到在內本鹿曾經發展為階序化社會之可能性（黃應貴等 2001）。另外，楊淑媛根據內本鹿與北部布農人等歷史資料和她的田野調查資料，指出過去的布農族研究過於強調其平等主義之傾向，而另提出在平等性與階序性制度之間擺盪（oscillation）的布農人傳統政治體系之動態歷史假說（楊淑媛 2005）。

民亦被強迫集團移住（李敏慧 1997：70-77；葉家寧 2002：101-108；蔡善神 2004：第4章）。¹⁹

就在總督府的原住民政策被認為似乎漸有蕪穫的同時，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3 月 9 日的深夜到隔日清晨，發生了 10 幾個布農族人襲擊「清水」、「楓」、「嘉嘉代」等幾個駐在所之事件，包含日本警察及其家屬總共有 6 人死傷，這就是史上所謂的「內本鹿事件」。²⁰ 率領發動這起抗日事件的 Haisul·Takis-vilainan 等人在事後投降，最後包含他本身總共有 5 人被處決。總督府深怕還會再有「蕃害」發生，便將原本住在內本鹿一帶的布農族人全部強制遷移到山麓的部落去居住。²¹ 據說原本在該區域生活的布農族人被強制移住而離開 *mai-asang*，而住家則全被燒光（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離開 *mai-asang* 的族人移住到山麓各地，後來又輾轉遷移，至今大致上是分布在今稱為桃源、鸞山、紅葉、武陵以及永康之五個部落中（蔡善神 2004）。

（三）內本鹿的「尋根之旅」活動與「部落地圖」調查

內本鹿的尋根活動與「部落地圖」調查是以「布農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為中心進行。該基金會是由從小生長於延平鄉桃源村的原住民牧師白光勝於 1995 年所成立，經營著「布農部落」與「紅葉溫泉」等兩處文化觀光設施，對該地區住民的教育、福利、就業有非常大的貢獻。²²

¹⁹ 在台東地區的大規模集團移住政策實施的直接原因就是由於布農族人的駐在所襲擊事件——大關山事件（1932 年）、逢坂事件（1933 年）所引起的（黃應貴 2001：52-55）。

²⁰ 據說發動事件的原因是：新的移住環境惡劣、日本警察對原住民非常嚴厲的管制等。而且，有關當時總督府方面的因應可以參見記載於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之機關報《理蕃の友》的報導（「內本鹿ブヌンの兇行」1941 年 4 月號；「內本鹿事件第二回發表」同年 5 月號；「內本鹿事件第三回發表」同年 7 月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93），以及當時日本警察的手記（青木說三 2002）。

²¹ 他們遷入的地方也就是今日的延平鄉的丘陵地，原本是布農族東邊的鄰居，即原住民 Livah-livah（自稱為 Murivurivuk，現居住於初鹿的卑南族）的勢力範圍。

²² 參見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之網站〈<http://www.bunun.org.tw>〉。

為了挖掘自己的歷史以及探討未來在地發展的可能性，基金會於 2001 年 11 月起開始自主性發起內本鹿的尋根活動（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11-13）。基金會不僅做「尋根之旅」（或「舊部落探勘」）活動，後來也獲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等的協助，與主導花蓮台東地區「傳統山川地名調查」的國立台東大學劉炯錫及研究員延平鄉布農族人阿力曼等合作，利用 GPS 與 GIS 來繪製「部落地圖」。同時也訪問部落的耆老們，採訪有關內本鹿之資訊，以及帶著 GPS 實地走訪調查內本鹿一帶的 *mai-asang* 並記錄其數據；這些都是繪製地圖的具體作業。實地走訪調查時，調查之內容不單只是記錄各個 *mai-asang* 之相關位置而已，並且確定曾經居住的氏族、土地利用狀況等記錄，調查氏族的傳承以及遷移史等。雖然實際參與調查的大部分都是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等，不過部落的耆老們也扮演強而有力的資訊提供者，對「部落地圖」調查有很大的貢獻（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花費了 4 年多的歲月投注於「尋根之旅」活動與「部落地圖」調查的基金會工作人員們，引用內本鹿是「歷史的窗口」這句話（黃應貴 2001：4），並指出在 1929 年的台灣地形圖（五萬分之一）中此一帶乃是空白的，以及在地布農族人是抵抗殖民統治一直到最後的一批人，並且強調建構主體性歷史解釋的重要性（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57）。同時，他們也將尋根過程的影像編輯成記錄片，在各地的布農族部落舉辦放映會與調查報告會（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2002b、2003）。他們也在文建會的協助之下，於 2002 年的世界人權日（12 月 10 日）這一天，利用直昇機將布農族的 15 位耆老們送到在日本殖民期為該區域之行政中心——當時被稱為「壽」駐在所。²³ 那一天，文建會主委（當時是陳郁秀主委）亦隨行前往，她所揮毫的「內本鹿元年」之旗幟被高高地掛在至今仍存在著的駐在所升旗台上。

²³ 布農語叫做 *Pis-paz-an*，「種植雜糧（*paz*）的地方」之意。其由來應該是與當時日本警察推動種植陸稻有關係。

有關內本鹿這些年來的活動，基金會人士向筆者表示，「尋根之旅」以及「部落地圖」調查活動的意義在於連結失落的內本鹿之歷史與現在的布農族之間的重要性，他們打算繼續向政府要求歸還土地或共同管理，並規劃未來內本鹿地區之開發等計畫（石垣直 2005）。另外，在地布農族人蔡善神（Tahai·Bainkinuan, Is-lituan）「基於對民族、部落的使命感」、從「本民族觀點」記錄了內本鹿調查的始末，並參考了李敏慧（1997）所整理的歷史文獻完成內本鹿地區布農族遷移史的碩士論文（蔡善神 2004）。

四、「部落地圖」調查之省思與建議

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地圖」調查在原民會主導的「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報告書裡已經有其課題以及未來研究計畫之評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5-79）。將該報告書中的「整體執行問題」整理歸納為以下 6 點：1.在地調查人員對地圖及 GIS 等相關知識與經驗不足；2.與其他調查研究（如「傳統山川地名調查」）的互補之不完整；3.學術輔導員與在地調查人員之間的溝通不足；4.對調查成果的準確性與正當性之考量較不足；5.耆老們相關傳統領域知識（或記憶）逐漸凋零；6.因為迭有傳統領域的重疊現象，而牽引到領域範圍與權利的問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67-69）。

另外，其報告書裡的「後續工作建議」與「未來工作計畫」，筆者歸納為以下 7 點：1.研究計畫長期繼續；2.調查成果審查、傳統領域資訊系統以及政策運用機制之建立；3.透過舉辦調查成果說明會促進在地人的參與，提高調查資料之公共性；4.以「示範部落」調查為後續相關政策研擬之參考；5.建構調查成果的拼音及轉譯系統；6.設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研究中心；7.維護原住民族文化與集體智慧資產並研究其使用原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70-74）。

因為筆者已經發表過的看法（石垣直 2006）與上述報告書中的內容大致相近²⁴，所以本文中不再逐條討論。唯，針對前節原民會報告書對「傳統領域」的定義以及上述「整體執行問題」之第 6 點的「傳統領域的重疊現象」，筆者在此擬以人類學的角度提出省思。以下筆者將以布農族之內本鹿調查為例省察現行的「部落地圖」調查之正面作用與困境，進而提出對未來研究調查的建議。

（一）「部落地圖」調查之正面作用

有些後現代地理學者指出，地圖並不是描述現實世界的客觀性存在，而是記錄並控制空間之重要工具（Harley 1988, 2001；Black 1997[2001]），並且在近代國家建構「國族」（nation）之企圖上它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Thongchai 1994[2003]；Anderson 1991[1997]）。其實「部落地圖」對台灣的原住民而言是一種「舶來品」，據筆者所知，目前尚無證據指出台灣原住民的祖先曾經使用過「地圖」。那麼，在現代台灣社會裡原住民族為了探究歷史與恢復原住民族權利而推動的繪製「部落地圖」，對原住民族社會帶來什麼樣的作用。²⁵

法國歷史思想家狄雪圖（de Certeau, M.），在有關「日常生活實踐之創造性」的著作當中，比較著以西洋都市計畫或從高樓俯視為例之「觀察者」的視線和以在都市裡散步者為例之「逍遙者」的視線——透過自己的經驗或行為對被都會計畫固定化、整體化的空間建構新的解釋，而強調後者的日常創造性（de Certeau 1980[1987]：197-265）。對狄雪圖而言，地圖是一種屬於「觀察者」視線的產物，它會忽略日常生活實踐的創造性行

²⁴ 筆者於 2005 年 3 月 26-27 日之國際研討會（參見本文註 4）發表之原稿於 2005 年 1 月底完成交稿。同年 2 月 24-25 日筆者參加了「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學術研討會」時，才知道原民會 2004 年底出版的研究報告書（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4）之存在。因此該稿未及將這本報告書列入參考。

²⁵ 在現行「部落地圖」調查中，包括外界的參與者與在地人的關係性，以及運用 GIS 科技之問題（例如：在地人對於 GIS 尚未熟悉）與其權力結構等問題，將牽涉到更廣泛的資料列舉與理論性探討，留待另文處理。

為。但是，在本文介紹的由原住民族「部落地圖」調查之脈絡上，地圖也有其創造性或抵抗性。如上所述，基金會人把內本鹿看作「歷史的窗口」，而強調透過「部落地圖」調查建構主體性歷史解釋的重要性。到此，繪製地圖並解釋歷史的主體不是在於國家或殖民者而是原住民自己，原來由於近代國家或者殖民地政府來記錄、控制空間，建構國族的工具（即地圖），變成為弱勢者用來抵抗主流社會（或政府）之工具（石垣直 2003：94-97）。

再者，繪製「部落地圖」的正面作用不只限於對外的抵抗力。基金會之人士在調查報告會當中用地圖、立體模型以及記錄片的方式把內本鹿的地景(landscape)呈現給族人看（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後來，看過被「影像化／可見化」(visualization)之內本鹿的布農族年輕人告訴筆者說「我們的祖先曾經在那裡以狩獵和種植小米來生活」、「那裡就是我們祖先曾經住過的地方。我下一次一定也要參加實地探勘 *mai-asang*」。在 1970 年代以後興起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所提出的「空間(space)」與「地方(place)」的差別，前者的特色是自由、開放、威脅、抽象性以及非主體性；後者是「空間」的一部分，但是其特色是安全、感情、經驗以及主體性，即被人賦予特別的意義（Tuan 1977[1993]；Hirsch 1995）。如按照這種概念區分，對台東縣延平鄉的一些布農族人²⁶（包含沒有參與實地探勘的族人）而言，「部落地圖」調查也可說是把已經荒廢或被忘卻的「空間」（即內本鹿）轉換為「地方」——即（再）建構歷史主體性而（再）確認其族群認同之基礎的一個工具或契機（石垣直 2003：99），至此內本鹿變成為一種「聖地」（石垣直 2004、2005）。

土地（也包含水域）不僅是一種經濟資源(resource)，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認同之泉源，這種藉著土地之記憶來（再）建構認同的狀況在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例子（e.g. Mageo (ed.) 2001；Climo & Cattell (eds) 2002；

²⁶ 台東縣延平鄉的另外一些布農族人是從現在的海端鄉山區（新武呂溪流及其支流大崙溪一帶）遷移來的，他們的各個 *mai-asang* 不在內本鹿。

Stewart & Strathern (eds) 2003)。²⁷ 雖然人類社會一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在變遷，但是，對於平均只能活 80 年左右的人而言，不太起會變化而保留著其原貌的土地是有其穩固性或永續性的。筆者認為，當在對抗大規模全球化或「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之下擬強調自我族群之永續性時，我們更需要一塊有永續性的「地方」(place)或「起源」(roots)，也就是自己的「根」(roots) (Harvey 1993)。我們應該可以把強調自己的主體性而卻被邊陲化之台灣原住民族的「部落地圖」調查活動，置於這些更大的社會文化脈絡當中 (石垣直 2003、2004、2005)。

(二) 現行「部落地圖」調查之困境與其「出路」

除有建立歷史之主體性之正面作用之外，「舶來品」的地圖或製圖也會導致一些困境。針對西洋近代的製圖技術導入非西洋社會裡所產生的問題，在 Jefferson Fox 的研究中以一些學者對製圖之批判性回顧為基礎，整理出以下幾點：1.製圖會摧毀在地環境資源管理之動態性與其空間概念；2.製圖將挑起部落之間的衝突；3.誰是製圖之主體；4.由誰來控制其調查成果及如何取得與流通之問題常被忽略 (Fox 2002)。²⁸ 這些論點在林益仁的論文中亦曾被引述 (林益仁 2001)。此外，Fox 透過 19 世紀初期於暹羅 (今之泰國) 的製作地圖政策與他自己參與的 20 世紀末於柬埔寨北部的製作地圖活動，做了比較以及檢討而提出了將西洋近代的製作地圖技術導入非西洋社會時應注意之論點，可歸納成以下五點 (Fox 2002: 76-77)：

²⁷ 譬如，M. Cattell 以美國賓州 Philadelphia 郊外城鎮為例，提出耆老們在愈來愈多外來移民而被忽略的過程當中，透過「回想」(remembering)過去的「地方(place)」及其記憶來「再成員化」(re-memembering)自己以及與自己關聯的存在之意義的例子 (Cattell 2002)。另外，C. Crumley 以法國勃艮第(Bourgogne)地方為例，描述在歐洲聯盟(EU)合併及環保意識高漲的潮流之下被視為從上一代到下一代傳承其記憶以及抵抗全球化的象徵之「菜園」(vegetable gardens)的狀況 (Crumley 2002)。再者，A. Smith 以 19 世紀愛爾蘭被英格蘭統治並製圖為例，指出殖民化與製圖的關係以及英格蘭之殖民主義與愛爾蘭之國族主義在地圖上產生的衝突之事例 (Smith 2003)。

²⁸ Chapin 等也提出同樣的課題 (Chapin et al. 2005: 630-631)。

1.在地的多層性權利關係與空間概念，和以單一性且排他性之支配權為前提的西洋空間概念之相異，前者容易被後者所取代。

2.在地人若無借用外來之物（如：製圖技術），則無法抵抗外來勢力。

3.製圖不僅確定國與國或部落與部落之界線，同時也會導致對各種資源及複雜的權利之要求。

4.由於自己控制地圖才能主張自己的傳說、故事以及對土地的要求，所以「由誰來控制(control)地圖」是比「誰來繪製地圖」更加重要。

5.製圖是比較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性領域之一部分。

如 Fox 第一論點所述，在現今台灣「部落地圖」調查亦受到西洋近代的空間概念(conception of space)的影響。譬如，本文第二節提到原民會主導的「部落地圖」調查之基本態度，是為了調查原住民族的土地以及相關知識，進而「確定傳統領域」。可是在其研究計畫背後筆者所見到的是「在某個領域與土地上有『傳統』所有者以及控制這塊土地之團體的存在」之先見觀。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正是 Fox 所述之西洋近代的空間概念，亦即單一性、排他性之支配權為前提的觀念。其結果顯示，以「確定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與傳統領域之土地位置、範圍」為目標的研究計畫落實在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調查中時，常會遇到許多問題。譬如，原民會將所謂的「傳統領域」之時間點設定於「日治時期以後」²⁹（參見本文第二節「研究調查項目」之 2.）。那麼在為期 50 年的日治時期，以及在那之前的「傳統領域」又該以何基準來判定呢？或者日本殖民期以前的土地權利以及族群關係該如何看待？現行的「部落地圖」調查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

以上述的內本鹿為例，根據蒐集的口述歷史，馬淵東一判斷第一批布農族人從新武路溪岸經由大崙溪之 'Dah'dah' 遷入到內本鹿是大約在 1870

²⁹ 根據原民會 2002 年的報告書中指出，將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的時間點定於「日治時期以後」之原因是，自日治時期開始才有了大規模國家力量的干預以及現代科學調查記錄之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2：I-15）。

年代中期³⁰，更早期這塊土地「北部是魯凱族萬斗籠社（Laiponok）、中部以及西南部是大南社（Taloma），東南部是卑南族北絲蘭社（Livax-livax），南端的較小一塊土地是魯凱族大巴六九社（Tamalakao）的獵場」（移川子之藏等 1935：167）。而且馬淵指出頗重要的田野調查之成果，即，雖然遷移到內本鹿之有些布農族人以為透過獵槍、豬以及鐵器等禮物送給南部原住民而「購買」了這塊土地，其實他們只獲得居住之許可，以後也還有將「收穫物與獵物之一部分」送給萬斗籠社以及大南社等的義務。他亦指出，當時有些布農族人已經開始不遵守這些義務行為（移川子之藏等 1935：168）。關於這點，筆者 2004 年 9 月與 2006 年 1 月在高雄縣茂林鄉萬山村等實施田野調查時，Oponohu 的後裔至今仍如此主張：「那塊土地只是借（*pasulia*）給布農族，而非讓渡給布農族」、「所以當我們到內本鹿的時候，布農族一定有送我們需要的食物以及火藥等的義務。布農族老一輩的人應該還記得我們跟他們祖先之間的約定」。

再者，如果追溯到神話或發祥地時代，甚至連布農族許多 *asang-daingaz*（大聚落）零星分布的南投縣南部、玉山一帶的土地，皆有北鄒族主張該地是其發祥地（移川子之藏等 1935：183）。而且，由於總督府的移住政策，被迫移出內本鹿的布農族目前的生活區域原本是在鄰接的 Livah-livah 之勢力範圍下，其一部分是 Oponohu 和 Livah-livah 等神話裡作為發祥地或者祖居地（宋龍生 1998：76-78；喬宗恣 2001：59-60）。即使不考慮到神話傳說，由於殖民地政府政權的介入而發生「傳統領域的重疊」之事例，亦存在於高雄縣或南投縣的布農族居住地。³¹

³⁰ 關於其遷入時期目前沒有明確答案，各學者的假說如下：李敏慧「遲至 1880 年代」；黃應貴「最遲到 1880 年代」；王土水（阿力曼）「19 世紀中葉」；蔡善神「至少可追溯到十八世紀中後期」（李敏慧 1997：21；黃應貴 2001：4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3b：11；蔡善神 2004：62）。其中蔡的論文之「十八世紀中後期」，以其前後文脈判斷，應該是「十九世紀中後期」之誤植。

³¹ 現在許多布農族人居住的高雄縣三民鄉和桃源鄉是曾經屬於南部鄒族（卡那卡那富 Kanakanabu 以及沙阿魯阿 Saaroa）的土地。另外，曾經居住在玉山以北的台灣中部山脈之布農族人因總督府的移住政策，遷徙到陳有蘭溪西岸的土地，那裡曾是屬於北鄒族之一支派 Lufutu（在地的布農族郡社群稱之為 Tanaul）。

雖然林也參考了 Fox 的論點，提出了「過去的彈性空間消失」以及「升高部落間衝突之危險性」這些論點（林益仁 2001），可是目前為止，筆者認為現行「部落地圖」調查還沒有真正地面對「確定傳統領域」這個先見觀可能會造成之問題。所以筆者擬在此從人類學研究的角度探討布農族「傳統」（即被殖民化以前的）土地的制度與觀念。

對布農族人而言，第一個把某一塊土地(*dalaq* 或 *dalah*)或森林(*libus*)作為獵場(*qanupan* 或 *hanupan*)的氏族或亞氏族，即握有對這塊土地的權利之群體便稱為「土地的主人」(*taimi-dalah*)。³² 不過，如上所述，因為布農族各氏族（或亞氏族）成員是為尋求狩獵地及山田燒墾地而不斷地遷徙或擴大其活動範圍，所以其狩獵地及山田燒墾地散布於台灣山地各處。因此，一直到現在在台東縣及高雄縣的布農族人還保留「祖先曾經住過 *Mungzavan*（更早以前住在 *Lamungan*）」³³之說法。如此，我們可以說是布農族之「傳統領域」是動態性的。可是，如果太強調其動態性，則可能會讓他們在主張對土地的權利時遭到「去賦權化」(*dis-empowerment*)。所以「傳統領域之動態性」論點是具有一刀兩刃的正負面影響力。但是這種判斷也許是我們現代人接受了「西洋近代之空間概念」所造成的先見。提出其「正負面影響力」之判斷前，我們必需進一步討論在地的土地制度或觀念。

對布農族人而言，其有關土地的權利是同一氏族或其內部的其他亞氏族成員共享的。但是其他氏族成員在取得「土地的主人」的同意後，以繳交一部份獵物或收成的作物作為「獵租」或「地租」³⁴為條件，也能夠在其土地上進行狩獵或山田燒墾。針對開墾的耕地，租地者如用小米酒款待

³² 也有 *taima-dalaq* 或 *taini-dalah* 等名稱。

³³ *Mungzavan* 有時也稱為 *Bukzavan*。「*bukzav-an*」即意味著「平坦之地」，現在的八通關古道大分一帶。另外，雖然 *Lamungan* 之確切的地理位置不詳，但據說是現在的南投縣名間一帶。

³⁴ 布農語叫做 *pais-dalah*、*pais-huma*、*pais-hanupan*、*pinasah*（「後腿」）、*paska-pinasah* 等（帝國學士院 1941）。

其近鄰的「土地的主人」之成員，就可以取得這塊土地的耕作之權利，而成為「耕地的主人」（*taimi-huma*）。可是這一塊地原來的「土地的主人」之權利不會消失；反之，原來的「土地的主人」想利用「耕地的主人」開墾過的土地時，也同樣需要用小米酒款待該「耕地的主人」之成員（馬淵東一 1974：208）。再者，布農族人認為「土地的主人」的感情、祝福以及咒詛會影響到利用這塊土地的其他氏族成員，使人在狩獵以及耕作時發生幸或不幸的遭遇（馬淵東一 1974）。³⁵ 這類被殖民化之前的土地制度和土地觀念與布農族人的靈魂（*hanitu* 或 *qanitu*）觀息息相關（黃應貴 1992）。如果日治時代有些學者所記載以及現代的布農族耆老們所說的布農族遷移歷史屬實，那麼 1930 年代初期的內本鹿布農族人以及萬斗籠社人受訪者所說的口述歷史——先住者與後住者對同一塊土地上的多層性權利關係以及初期的戰爭之後透過交換禮物（及通婚）來建立的友誼關係，即很容易可以理解。

雖然原住民族的「還我土地」運動乃至實現自治區的訴求是現在及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然而筆者認為與在此所提出的「傳統領域之動態性」論點及「在地土地制度與觀念」之研究不能混為一談。歸還土地、管理以及自治等並不是單純的復古主義之行為，而是現代的原住民族所面臨到的，該如何連結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之重要議題。原住民族現在面臨著如何利用外來的工具（即地圖）來向主流社會（或政府）要求其應有的權利，同時也必需儘可能地避免重蹈近代國家之覆轍，如領土所有權問題或民族紛爭等之問題。筆者認為，了解在地住民的土地觀念及制度，或許是迴避可能發生紛爭的方法之一。

（三）歷史文獻翻譯／解讀之重要性

筆者在布農族各部落實施田野調查時，常遇到布農族人向筆者要求「把在日本的日治時期文獻翻譯或介紹給我們」。這是因為很多原住民相

³⁵ 馬淵指出有關先住居民與土地的這種「magico-religious」關係在世界各地（如：東南亞地區、非洲西部等）之類似的例子（馬淵東一 1974）。

信日治時期有關原住民文獻資料大部分都還留在日本之「傳說」，也是因為他們並不了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聯合國打敗撤離時，有關原住民資料及文物不能帶回日本，許多日治時期重要文獻資料依然留在台灣³⁶的這項事實。因此，筆者認為，翻譯／解讀歷史文獻資料是一項重要工作。雖然有些主要歷史文獻已經有了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等研究機關的初步中譯版，但大部分文獻一直嚴密保管於該所圖書館中尚未完全對外開放，非研究人員之一般人不容易閱覽。歷史文獻翻譯／解讀工作是在重視以在地人為主體性的「部落地圖」調查裡非常重要的一環，像這類歷史文獻不應只是做為學者專家之「珍貴研究資料」，而是必須盡量使之公開並流通使用才是。³⁷

或許有些人認為翻譯只是一個簡單的「語言轉換」，但其實它在「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過程中與賦權或者在地的主體性建構之間有很重要的關聯。譬如，夏威夷人學者 A. Stillman 以夏威夷的呼啦舞(Hula)的歷史文獻為例，指出在「再回收」(re-membling)文化記憶並去殖民化知識而自我決定其未來的過程中，「取回」(recovery)博物館及圖書館(公文書館)裡歷史文獻之重要性(Stillman 2001)。本文第三節第(三)小節提到的布農族人蔡善神，不僅以其本族人之優勢收集到詳實的田野資料，並且參考了李敏慧所整理的日治時期歷史文獻(1997)，而得以完成其建構布農族在內本鹿之歷史主體性的論文。此即歷史文獻與繪製「部落地圖」，在建構歷史主體性的過程中互為輔成的一個例證。

因此，對未來的「部落地圖」調查，筆者建議應加強台灣原住民各族群與土地關係的各歷史時期(荷西、鄭氏、清朝以及日治時代)文獻的翻

³⁶ 所藏地點是在，譬如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中央研究院、國立台灣博物館、國立台灣大學和各地的戶政事務所等。

³⁷ 雖然該所已出版了一部分日治時期文獻之翻譯，譬如《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系列，可是圖書館內大部分的翻譯版並未完全公開。

譯／解讀工作。為了進一步理解在地的土地觀念與制度，這些歷史文獻翻譯／解讀應該要與在地人共同進行，加以對照。³⁸

此外，歷史文獻翻譯／解讀工作，不僅是學術研究成果對在地社會的回饋，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者「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之下(Beck et al. 1994[1997])，學術研究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愈來愈活性化，人文／社會科學者必需重視在地人如何看待及利用這些研究成果³⁹，即學術研究之流通以及對在地社會之影響問題(Giddens 1976[1987])。筆者認為，原住民族「部落地圖」調查活動對「學術研究之反身性(reflexivity)」研究將可提供非常有意義的事例與思考空間。

五、結 語

本文主要是以筆者觀察布農族的內本鹿調查之所見，反映台灣原住民社會之「部落地圖」調查現況之一隅，並從人類學的角度省思這類的研究調查中所隱含的西洋近代空間概念和土地所有制度的先見觀，及其與在地人對土地概念的相異，進而指出可能產生的困境。歸納而言，筆者對今後此類的研究計畫之幾點建議為：1.正視「傳統領域之動態性」論點之重要

³⁸ 筆者認為，在亟需翻譯／解讀的諸多文獻當中，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之民族史(ethnohistory)的研究成果《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移川子之藏等 1935)是應該首要翻譯／解讀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這本著作是 1930 年代初期所做的調查，依據各族受訪者的口述而留下的原住民各族歷史的珍貴記錄。其中，馬淵東一所調查有關布農族的部分(第三章)，詳細地記錄各氏族的由來、遷徙傳承等。透過他的謹慎態度與詳細的描述內容，我們可以了解當時布農族歷史之動態性與布農族人口述歷史之多樣性。但是，為了避免這些歷史文獻內容被「經典化」(canonization)，當解讀這些文獻時，讀者應該也要了解當時包括執筆者、調查目的與方式以及學術潮流等之時代背景。關於這些歷史文獻經典化之盲點，筆者是接受了笠原政治(國立橫濱大學教授)以及蛸島直(愛知學院大學教授)之意見，在此謹對兩位學者表示謝意。

³⁹ 如上所述，有些布農族的在地研究者要求筆者介紹與翻譯日治時期歷史文獻資料給他們。其中有一位是母語研究者，他想要參考日治時期的文獻，用母語編寫整個布農族歷史，作為布農語歷史教材提供給年輕一代族人。

性；2.加強對在地的歷史文化及社會（尤其是土地觀念及土地制度）之調查研究；3.重視歷史文獻之翻譯／解讀，以助在地人建構其歷史主體性。

本文是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所推動的「部落地圖」調查現況，加以稍具批判性之省思，願藉此拋磚引玉，與學界先進共同思考與探討。誠如林益仁所指出，「部落地圖」並不是「萬靈丹」，可是也擁有對在地社會賦權之可能性（林益仁 2001）。筆者衷心亟盼現行「部落地圖」調查終能克服本文所指出的若干問題，而使台灣原住民族透過這類「部落地圖」調查實現其多年來建立主體性之理想。

參考文獻

（中文）

台邦·撒沙勒

- 2004 《尋找失落的箭矢：部落主義的視野和行動》，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2002 《原住民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2003a 《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報告》，（同上）。

- 2003b 《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一期：花蓮縣及台東縣》，（同上）。

- 2003c 《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二期：南投魚池以南》，（同上）。

- 2003d 《原住民族傳統山川名稱調查：第三期：南投仁愛鄉以北》，（同上）。

- 2004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調查：研究報告書》，（同上）。

李敏慧

- 1997 《日治時期台灣山地部落的集團移住與社會重建：以卑南溪流域布農族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宋龍生

- 1998 《臺灣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阿力曼

- 2002 〈從內本鹿宣言談新夥伴關係〉，《原住民教育季刊》28：91-96。台東：教育部教研會。

拉芙嵐管理委員會（編）

1998 《拉芙嵐部落遺址 ASAN DAHULAN》，南投：宏文印刷廠。

林益仁

2001 〈「部落地圖」概念發展的社會脈絡與意義〉，《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太魯閣國家公園編。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http://www.taroko.gov.tw/VIRTUAL/data/2002/0613/13035949/03.htm>

（參看日期 2006 年 3 月 31 日）

施正鋒

2005 《台灣原住民族政治與政策》，台中：財團法人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秘書處

2005 《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光碟》，未出版。

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a 《內本鹿布農族傳統領域調查接暨部落地圖之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未出版。

葉家寧

2002 《台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黃應貴

1992 《東埔布農人的社會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01 《台東縣史：布農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

黃應貴等

2001 〈失落的內本鹿：一個邊疆社會中跨越族群界線的區域中心〉，《東台灣研究》6：139-172。

喬宗志

2001 《台灣原住民史：魯凱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楊淑媛

2005 〈台灣高地的政治體系初探：以布農人為例的研究〉，《台灣人類學刊》3(1)：185-219。

趙啟明

1999 〈重回聖地：Pinsabukan 祖石溯源之旅紀實〉，《山海文化》20：101-111。

蔡善神

2004 《內本鹿地區布農族遷移史研究（1942 年以前）：以遷往台東縣延平鄉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藤井志津枝

2001 《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三）》，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日文)

青木説三

- 2002 《遙かなるとき台湾：先住民社会に生きたある日本人警官の記録》，大阪：燃焼社。

アンダーソン、B. (Anderson, B.) 白井さや 白井隆譯

- 1997[1991] 《増補 想像の共同体：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東京：NTT 出版。

石垣 直

- 2003 〈故郷への帰還：台湾先住民・ブヌン社会における〈部落地図〉作成運動と想像力〉，《社会人類学年報》29：83-106。
2004 〈内本鹿への旅：〈尋根〉の人類学にむけて〉，《台湾原住民研究》8：36-73。
2005 《現代台湾社会の中の先住民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台湾・ブヌン社会における〈部落地図〉作成運動に関する人類学的研究》，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 2003 年度研究助成論文。
2006 〈〈部落地図〉作成運動：台湾・ブヌンの事例から〉，《台湾原住民研究：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回顧と展望》：115-128。東京：風響社。

移川子之蔵・宮本延人・馬淵東一

- 1935 《台湾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ギデنز、A. (Giddens, Anthony) 松尾精文等譯

- 1987[1976] 《社会学の新しい方法基準：理解社会学の共感的批判》(*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東京：而立書房。

瀬川孝吉

- 1954 〈高砂族の生業〉，《民族學研究》18(1・2)：49-66。

帝国学士院

- 1941 《高砂族慣習法語彙》，東京：ヘラルド社。

トゥアン、Y. (Tuan, Yi-Fu) 山本浩譯

- 1988[1977] 《空間の経験：身体から都市へ》(*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東京：筑摩書房。

トンチャイ、W. (Thongchai Winichakul) 石井米雄譯

- 2003[1994] 《地図がつくったタイ：国民国家誕生の歴史》(*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東京：明石書店。

ド・セルトー、M. (de Certeau, Michel) 山田登世子譯

- 1987[1980] 《日常的實踐のポイエティック》(*Art de Faire*)，東京：国文社。

- ブラック、J. (Black, Jeremy) 関口篤譯
2001[1997] 《地図の政治学》(*Maps and Politics*)，東京：青土社。
- ベック、U.他 (Beck, U., A. Giddens and S. Lash) 松尾精文等譯
1997[1994] 《再帰的近代化：近現代における政治、伝統、美的原理》(*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東京：而立書房。
- 馬淵東一 (Mabuchi T.)
1974[1971] 〈中部台湾および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呪術的・宗教的土地所有権〉，《馬淵東一著作集》3：201-244。東京：世界思想社
 (“Magico-religious land ownership in central Formosa and southeast Asia”，《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慶祝凌純聲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之一）》29：349-383）。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1993[1932-1943] 《理蕃の友》（第三卷），東京：綠蔭書房。
- 山路勝彦
2004 《台湾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歐文）

- Cattell, M. G.
2002 “Remembering the Past, Re-membering the Present: Elder's Constructions of Place and Self in Philadelphia Neighborhood”, Climo, J. J. & M. G. Cattell (eds)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81-94. Walnut Creek: Altamila Press.
- Chapin, Mac / Z. Lamb / B. Threlkeld
2005 “Mapping Indigenous Land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4: 619-638.
- Climo, J. J. & M. G. Cattell (eds)
2002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Walnut Creek: Altamila Press.
- Crumley, C. L.
2002 “Exploring Venues of Social Memory”, Climo, J. J. & M. G. Cattell (eds) *Social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39-52. Walnut Creek: Altamila Press.
- Fox, Jefferson
2002 “Siam mapped and mapping Cambodia: Boundaries, Sovereignty, and Indigenous Conceptions of Space”,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5(1):65-78.
- Harley, J. B.
1988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Cosgrove, D. & S.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277-3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92] “Deconstructing the map”, Laxton, Paul (ed.)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149-168. London: Routledge.

Harvey, David

1993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Reflec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ird, J.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s*: 3-2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Hirsch, Eric

1995 “Landscape: Between place and space”, E. Hirsh & M. O'Hanlon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1-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geo, J. J. (ed.)

2001 *Cultural Memory: Reconfiguring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colonial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mith, Angèle

2003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Place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Ordnance Survey Maps of Ireland”, P. J. Stewart & A. Strathern (eds) 2003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71-88. London / Sterling / Virginia: Pluto Press.

Stewart, P. J. and A. Strathern (eds)

2003 *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Sterling / Virginia: Pluto Press.

Stillman, A. K.

2001 “Re-membering the History of the Hawaiian Hula”, J. Mageo (ed.) *Cultural Memory: Reconfiguring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the Postcolonial Pacific*: 187-20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Yang, Shu-yuan (楊淑媛)

2001 *Coping with Marginality: The Bunu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其他資料（報紙、記錄片以及網站等）

自由時報

2003 年 11 月 23 日，〈平埔族尋根：踩著先民足跡返鄉〉。

台灣日報

2003 年 11 月 27 日，〈噶哈巫祖居地尋根〉。

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

2002b 《打開台灣歷史的窗口》（記錄片，約 30 分鐘）

2003 《回到埋葬肚臍的地土》（記錄片，約 60 分鐘）

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bunun.org.tw>〉（參看日期 2006 年 3 月 31 日）

Reflections on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es: A Case of the *Laipunuk* Research by the Bunun

ISHIGAKI Naoki

Abstract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 has become a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movement in indigenous societies of Taiwan in recent years. This is the movement where Austronesian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investigate and map their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By conducting this kind of surveillance study, they try not only to demarcate their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and dig up land-rooted histories, but also to claim indigenous rights for their group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consider positive influences and controversial points of current indigenous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 in Taiwan. Firstly the author introduces current governmental policy towards this research and secondly describes the native initiative *Laipunuk* research by the Bunun. Finally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ommunity mapping research: 1. Importance of introducing a concept of “dynamic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2. Importance of more detailed research on local land systems and conceptions of land; 3. Need for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their lands to support self-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subjectivit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Community mapping Land Bunun *Laipunuk*